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阶段*

华生 汲铮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引起广泛关注、研究和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剖析,发现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并存在争议性。首先,援引世界银行报告中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而用相对收入追赶指数来划分发展阶段的赶超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有明显缺陷;其次,从多数学者认同的定义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在讨论中已被转换,陷阱成为阶段的同义语,讨论的真实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最后,讨论约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三个主要指标,即人均 GNI、通货膨胀率和汇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阶段 东亚奇迹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 2007 年出版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世界银行,中译本 2008)报告中首次被提出的。报告旨在探寻东亚地区的政府应该如何实施发展战略来应对伴随着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而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陷入困境与动荡,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也显著放缓,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激发了国内学界和媒体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关键词的学术文章和媒体报道不胜枚举,乃至官方的报告中也频频出现。与国际上经济学界较少提及和关注这个概念不同,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被人们当作一个极为有用并早已被证明的定义。

国内学者们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成因以及走出“陷阱”的对策做了大量工作(胡鞍钢,2010;姚洋,2011;刘伟,2011;王一鸣,2011;吴敬琏,2012),尤其是经验的梳理以及实证的分析(郑秉文,2011;乔俊峰,2011;林毅夫,2012;史晋川、郎金焕,2012)。但有意思的是,研究者们对“究竟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解却并不相同。而在国外学者中,普利切特和萨默斯(2014)、艾肯格林等人(2012,

2013)虽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做了量化的研究,但各自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观性很强。显然,对一个大为流行的概念,如果连它到底是什么含义或定义都不清楚,自然会影响到我们对问题的准确把握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本文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进行辨析,厘清认知,但绝非仅仅纠正一个混淆、模糊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这个志在实现伟大复兴又恰有机遇在前的文明古国来讲,如何找准问题、厘清方向和探寻路径,破除制约发展的枷锁和桎梏,从而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如上所述,中等收入陷阱在 2007 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首次被提及,但遗憾的是报告中并没有给出直接明确的定义。学者们从同一个报告中梳理出了不同的定义。蔡昉(2012)和华生(2013)直接援引报告中原话“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会相对较慢”,并认为这就是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而刘世锦(2011)同样引用报告原话,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就是指:“历史表明,许多经济体常常都能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但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因为实现这一跨越所必需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变化,在技术、政

* 华生、汲铮,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11189,电子邮箱:huasheng@vip.sohu.net,jz0429@163.com。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治和社会方面更复杂、更具挑战性,许多拉美和中东经济体数十年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刘世锦的定义含有先快后慢的自我比较和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两层意思。更多学者认同的定义是,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林岗等,2011;郑秉文,2011;王一鸣,2011;田国强等,2013;张德荣,2013)。这个认识并未引用报告原文,是学者们自己提炼的。

此外,以上的定义都以世界银行的现价美元标准划分低、中、高收入阶段。鉴于划分阶段的主观性以及不可避免会产生的各种问题,Woo(2011)尝试用追赶指数(Catch Up Index, CUI)这一指标来划分阶段,进而定义“中等收入陷阱”。

纵观以上定义,虽然都是定义中等收入陷阱,但却不尽相同。前者是从比较意义上论述,强调的是中等收入国家与较富或较穷的国家相比会出现较慢的增长,这完全是一个相对比较概念;后者Woo的定义也是比较,但从赶超这个视角来观察一个经济体是否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而大多数学者的定义则聚焦在中等收入经济体本身,认为当人均收入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后因各种体制、机制原因,会出现经济放缓或停滞,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一个相对比较概念、一个赶超概念,还是一个阶段概念?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探讨真正聚焦的又是什么命题?

三、比较意义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

比较意义的“中等收入陷阱”定义出自世界银行《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综述部分第5页,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国家的成长会相对较慢,这也说

明为什么20世纪的世界经济没能缩小贫富差距。”报告援引Garret在2004年的研究指出,从1980—2000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提高了50%,而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增加了超过150%,因而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比降低了一半。但是同期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只增长了大约20%,因此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反而拉大了。应该说,这个理解最接近世行报告的本意。不过,Garret研究的时间跨度大约是20年(1980—2000年),进入21世纪这十多年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如果把时间拉长到从二战后到现在这半个世纪的数据来检验,那么这种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相对较慢的陷阱还真的存在吗?

对此,用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2013)所提供的214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增长以及低、中、高收入分类的汇总统计数据进行说明。其中,分类汇总数据为世界银行的加权平均值。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是把不同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的。原因如下:第一,世界银行援引的Garret教授的报告就是把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成果的辨析,肯定要与其保持一致;第二,如若不以整体来分析,而是从整体中选取一个或若干经济体来分析,就造成选择的主观性很强,所得结论也会有失偏颇。

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前提自然是要有不同收入阶段的划分。世界银行自1987年以来按人均国民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四类。世界银行对这四个阶段的分类阈值一直进行动态调整(见表1)。以2012年为例,按当年美元价格衡量,103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阶段,1036~4085美元为中低收入阶段,4086~12615美元为中高收入阶段,之上则为高收入阶段。

表1 划分发展阶段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标准 单位:当年价格美元(按照汇率法衡量)

国家分类	1987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2
低收入	≤480	≤610	≤765	≤755	≤875	≤1005	≤1035
中低收入	481~1940	611~2465	766~3035	756~2995	876~3465	1006~3975	1036~4085
中高收入	1941~6000	2466~7620	3036~9385	2996~9265	3466~10725	3976~12275	4086~12615
高收入	>6000	>7620	>9385	>9265	>10725	>12275	>1261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如前所述,中等收入陷阱假说成立的基础是相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成长更

慢些。但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库提供的214个国家或地区1961—2011年GDP增长及低、中、高收入

分类的汇总统计数据,在这半个世纪的跨度上,低收入国家并未表现出比中等收入国家更快的增长(见图1),中等收入国家也未表现出比高收入国家更快的增长。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说并不能成立。

世界银行报告的真正意图和对很多人的吸引力其实并不在中等收入与低收入阶段的比较,而在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与高收入阶段的差异。即一个国家可能较易实现从中低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的转变,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转变就不

容易了。用世界银行报告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实现经济起飞的机制与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机制有着根本区别。从人们列为典型的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来看,其实都是处于世界银行所划分的中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对中国等亚洲经济体的警示也是在已经跨越了中低收入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才提出或引起广泛关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等收入陷阱说也可理解为中高收入陷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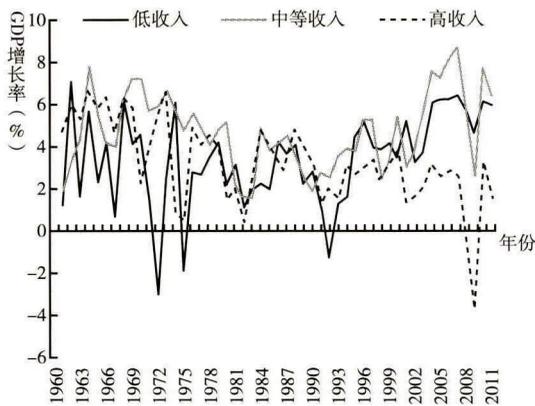


图1 低、中等和高收入经济体增长率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

注:世界银行指标数据库提供了214个国家和地区1961—2011年的GDP增长率以及低收入(low income)、中等收入(middle income)、中低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和高收入(high income)的分类汇总统计数据,上图据此做出。

但是,如果把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相对于中低收入在中高收入阶段的增长会更慢,也有人提出新的质疑。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安德森在《真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这回事吗》(2011)一文中就作了这样的数据对比。他选择了10个人均收入在8000~10000美元之间的中高收入国家与10个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发现中高收入国家虽然在1990—2000年期间确实遭遇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或徘徊,但在21世纪前10年中表现良好,因此拉长时段看,中低收入国家与中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几乎一样,并不存在中高收入陷阱的证据。

由于安德森选取的样本范围比较小,不少人认为他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还不充分。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如果对二战以来所有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三个阶段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做比较,就会发现中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在总体上也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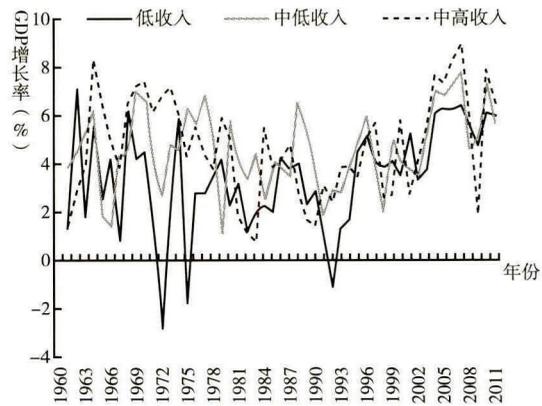


图2 低、中低和中高收入经济体增长率对比

不低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国家(见图2),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因此,比较意义上的中高收入陷阱也并不存在。

可见,若把不同收入分类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证的话,经验数据并不支持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说。也许正因如此,后来采用中等收入陷阱说法的学者,一般已不再谈及这个比较意义的定义。可以说,中等收入陷阱已经脱离其最初得以确立的基础,而演变成后人各自理解的意思。

四、赶超意义的“中等收入陷阱”有明显缺陷

鉴于用绝对收入来划分低、中、高阶段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观性及不可避免会产生的各种问题,Woo(2011)以高收入国家的标杆美国为尺度,按一国人均收入占美国人均收入比重的范围来定义低、

中、高收入阶段的范围。也就是说,若一国人均收入增长比美国更快,其占美国人均收入的比重就会上升,反之,比重就会停滞甚至下降。Woo将这比率称为追赶指数(Catch up Index, CUI),同时将 CUI < 20% 定义为低收入国家, 20% < CUI < 55% 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 CUI > 55% 定义为高收入国家。由于这个新标准把中等收入阶段的门槛相对于世界银行的标准提高了 7~9 倍,高收入阶段也提高了约 2 倍(见表 2),因此用这个 CUI 比率,战后几个主要拉美国家倒确实始终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亚洲的中低收入经济体则还在追赶的初期阶段,而只有东亚

五个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真正进入了高收入阶段(见图 3)。

当然不难看出,这个相对比重的定义也是有明显缺陷的,如阿根廷从战后初期接近于高收入又跌回到中等收入的中线。显然,这已完全不是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而是高收入悬崖,即从战后世界最富国家俱乐部之列跌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这种描述自然也是很不准确和略显夸张的,因为战后阿根廷实际上人均收入总体是在上升的,最近几年还上升很快,现已和几个拉美国家到达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边缘。

表 2 世界银行标准与 CUI 标准划分发展阶段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对比 单位:当年价格美元(按照汇率法衡量)

年份		1987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1
低收入	世行标准	≤480	≤610	≤765	≤755	≤875	≤1005	≤1025
	CUI 标准	<3879	<4608	<5512	<7016	<8503	<9322	<9622
中等收入	世行标准	481~6000	611~7620	766~9385	756~9265	876~10725	1006~12276	1026~12475
	CUI 标准	3879~10667	4608~12671	5512~15158	7016~19295	8503~23384	9322~25637	9622~26462
高收入	世行标准	>6000	>7620	>9385	>9265	>10725	>12276	>12475
	CUI 标准	>10667	>12671	>15158	>19295	>23384	>25637	>26462
CUI 标准/ 世行标准(倍)	中等收入门槛	8.1	7.6	7.2	9.3	9.7	9.3	9.4
	高收入门槛	1.8	1.7	1.6	2.1	2.2	2.1	2.1

数据来源:(1)世界银行收入分类标准(<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2)世界银行美国人均 GDP(现价美元)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CD>)。

注:追赶指数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门槛数值分别根据美国人均 GDP(现价美元)的 20% 以及 55% 计算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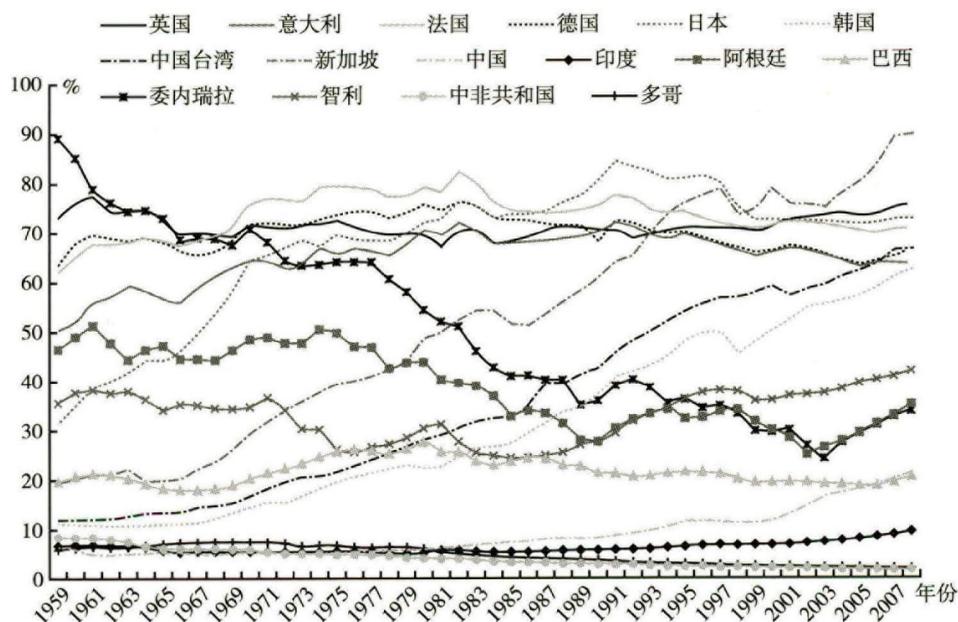


图 3 各国(地区)人均 GDP 与美国人均 GDP 之比

数据来源: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同时鉴于中等特别是高等收入门槛相对于世界银行的划定都太高,在进行比较的 132 个国家中,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数量就大大减少。在不同收入阶段的流动中,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还大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是缘于相对比重法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它暗含假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人均收入不仅在某些阶段上而且会始终一致走向趋同,应当说这是一个还没有被证明的命题。因为,后进国家固然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最前沿的国家一定也还有自己的领先优势,而各国的人均资源禀赋又相差甚大。后发国家只要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人民福祉就在不断提高,未必非要一定能够在各个阶段上都不断缩小与世界最领先国家之间的相对距离。实际上,从战后发展情况看(见图 3),即使是欧洲主要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也未见明显缩小,许多低收入国家与美国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显然,从上述数据看,比重法计算的 CUI 以美国为标杆以及各发展阶段阈值的设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由此定义的收入阶段与世界银行的定义差距很大,因此这种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自然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

五、停滞角度的“中等收入陷阱” 等同中等收入阶段

由以上讨论可见,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从比较意义上并不存在,从赶超意义上又有明显缺陷。那么,多数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等收入陷阱究竟是什么?除了上述刘世锦(2011)引述世行报告关于“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说法外,郑秉文(2011)将“中等收入陷阱”提炼为:一些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经济发展超过了人均 GDP1000 美元的水平,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同样的意思,王一鸣(2011)总结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0000 美元。田国强(2013)在表述相似意思后还

整合了胡鞍钢(2010)的现象描述,具体为:“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0000 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应该说,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但意思都与上述定义大同小异。如林毅夫(2012)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经济增长放缓,未能继续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的现象。而刘伟(2011)则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率出现回落,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姚洋(2011)则更明确地指出当我们谈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之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发生倒退的状态。

从这些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实际上已把中等收入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相等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在讨论中被转化,人们离开世行最初的比较意义,从绝对水平即处在中等收入区间来定义陷阱。只要一个国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或者简单地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没有超越 10000 美元的阶段,那就是处于中等收入陷阱。而描述的诸如增长方式转型困难、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等现象仅仅是这个阶段的伴生物。其实,这些现象在低收入阶段可以说一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而且不少问题在高收入阶段也照样存在,只是不同收入发展阶段上问题和重点都会有所差异罢了。由此可见,人们认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依据并非是在这些在其他阶段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而是人均 GNI 处在中等收入阶段这个硬指标。所以我们看到,学者们在讨论对策的时候,都聚焦在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因为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也就自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陷阱不过是阶段的同义语。而所谓东亚模式的成功也就是因东亚模式样板的几个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了高收入阶段。

当然,如果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阶段,那

么是否叫陷阱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过,我们从上面的引述还可以看到学者们关注这个问题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他们普遍把“停留”“徘徊”“滞留”“回落”在中等收入阶段上作为刻画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主要标志。但滞留多长时间算长,徘徊多久算陷阱,学者们似乎均未讨论或给出标准。与国内学者多停留在字面的模糊含义不同,部分西方学者一介入就注重对停滞的定量研究,试图将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清晰化,像前文所述比较有影响的艾肯格林等人(2012,2013)的研究将中等收入国家连续7年或更长时间人均GDP增速超过3.5%后再连续7年时间内增速下降至少2%的阶段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而艾肯格林等人在2013年的文章中修正了2012年论文中的部分结论,认为经济增长放缓并不是只存在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5000~16000国际元附近一种分布模式,还会出现在收入为10000~11000国际元附近。当然,还有学者用更复杂的方法来定义停滞进而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Aiyar et al,2013)。一般来讲,量化的研究会使问题更清晰,但是正如硬币还有另一面,一旦量化,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缺陷也暴露无遗。诚如艾肯格林(2014)自己所说,停滞论是经济学家的“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一种心理学测试),不同人眼中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但实际上,这是由于他们都是在中等收入阶段内去定义停滞问题,将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发生停滞而未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故必然是各有各的定义,给不出统一认知。这个争议颇多的讨论引发了哈佛大学的两位著名教授普利切特和萨默斯(2014)的加入。他们认为艾肯格林等人得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是缘于他们的研究局限于中等收入国家,而如果把视野扩展到不同收入阶段的国家,数据回归显示,他们定义的经济快速增长停滞其实在各收入阶段都存在。如日本1990年在快速增长后近20年的经济停滞时,早已进入高收入阶段。他们发现,从长期来看,经济从高增长“回归均值”水平的运动是唯一真正起作用的法则。因此,中国在高增长后向平均增长回归的作用可说10倍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而他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即使存在作用也很微弱。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不存在,但中等收入阶段则是

客观存在的,而且发展中国家存在力图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强烈愿望更可以理解。因此,撇开定义不一和难以独立成立的中等收入陷阱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所需的时间倒是可以定量分析了。

首先,无论是快慢起伏,还是稳步匀速前进,要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至少要有个最低增长速度。如上所述,世界银行对收入阶段区分的阈值每年会根据日本、英国、美国及欧洲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根据1987年与2012年阈值的对比来看,25年的时间阈值提高了两倍多,每年的复合增长达到3%以上。那么,倘若一个发展中国家以美元计价下的人均GNI增长不能大于3%,这个国家将永远停在中等收入阶段。换句话说,若要想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一个国家(地区)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NI增长水平应必须快于阈值调整速度。而若要不在于中等收入阶段逗留太长的时间,就要显著快于3%。那么,要快到什么程度呢?看来至少不能慢于拉美国家。因为在中等收入陷阱讨论中,拉美习惯地被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其主要的依据是:第一,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目前依然身处中等收入阶段之列(2013年,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拉美34国中仅有智利、乌拉圭两个大国以及巴哈马、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四个加勒比地区岛国进入高收入阶段);第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比较早,拉美的几个大国都在20世纪60—70年代相继被认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第三,滞留中等收入阶段时间较长,至今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平均滞留时间已40年以上,其中阿根廷已超过50年,多数国家在短期内还望无望跨越这个阶段。正因如此,拉美由于中等收入经济体比重大、进入时间早、滞留时间长,被作为中等收入陷阱典型来分析。

然而,仅仅以此就给拉美国家扣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帽子似乎也不尽公平。其一,世界上过去和现在的低收入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的时间是用千年来计算的。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的国际元统计各时代人均收入,发现工业革命前,人类在几千年农业社会中一直没摆脱低收入(见表3)。而现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短短几十年就称为陷阱难免言过其实。其二,如果从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这个指标来看,历史上处在同等收入阶段的先行

发达国家(地区)并不一定比拉美国家滞留在相应阶段的时间短(见表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战之后,

在全球化带来后发优势的背景下,人们对后发国家(地区)加速发展的期望。

表3 公元1—1820年世界平均人均GDP情况

年份	1	1000	1500	1600	1700	1820
世界平均(1990国际元)	467	453	566	596	615	666

数据来源: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表4 早期工业化国家(地区)与后发国家(地区)人均GDP增长所需时间

国家(地区)	人均GDP 2500(1990国际元)起		人均GDP 8000(1990国际元)止		时间(年)
	1853	2555	1957	8017	
英国	1853	2555	1957	8017	105
美国	1869	2516	1941	8206	73
意大利	1925	2602	1968	8382	44
德国	1893	2565	1962	8222	70
法国	1893	2535	1962	8067	70
日本	1939	2816	1969	8874	31
韩国	1973	2824	1989	8027	17
中国香港	1954	2546	1977	8707	24
中国台湾	1970	2537	1987	8598	18
新加坡	1962	2520	1979	8362	18
中国	1994	2515	2010	8032	17

数据来源: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回到世行关于东亚的报告,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东亚的奇迹。因为二战以来,全球180个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只有13个在25年或更长的时期内实现了平均7%或者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其中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除了不足50万人口的旅游岛国马耳他,只有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斯宾塞,2011)。与此同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实现跨越的时间也为世人惊叹,仅用不到二十年(见表5)。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经济体虽未取得如上经济增长成绩,但也悄然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见图4)。而从世界银行初次定义收入阶段的1987—2013年这短短的26年间,就有35个经济体迈入高收入阶段。也就是说,相对于世界经济体在低收入阶段延续几千年的缓慢发展,中等收入阶段真不是什么任何意义的停滞或陷阱,而是可以一跃而过的瞬间。

六、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定量经济分析

如前文所述,如果以世界银行的现价美元为依据,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或地区,要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这十倍多的收入跨越,一国若能保持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NI增长速度平均大于16%,2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就能大体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亚奇迹”。如果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NI增长速度降为8%,完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从进入到离开)则需要大概50年。倘若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NI增速进一步降为5%,花费的时间要达到百年

表5 东亚经济体人均GNI从1000美元到10000美元所需时间

国家(或地区)	人均GNI 1000美元	人均GNI 10000美元	时间(年)
日本	1966	1980	14
韩国	1978	1994	16
新加坡	1971	1989	18
中国香港	1971	1988	17
中国台湾	1976	1995	19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台湾数据来自于台湾统计年鉴。

注:世界银行设定收入阶段标准始于1987年,研究者普遍用1000美元、10000美元替代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之间的阈值;人均GDP根据汇率法计算(图表集法,Atlas法)。

以上。从1000~10000美元(当年汇率)来看,中国2001年人均GNI越过1000美元,即使按照现在的已经减慢的速度,其他条件不变,中国在2017或2018年越过人均GNI10000美元已是大概率事件,其跨度为17年左右,完全达到了创造东亚奇迹的经济体的发展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NI(这是世界银行划分收入阶段的标准),与我们一般所说的以本币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NI增速并不是一个尺度。这里还受到本币与美元的汇率变动和本国名义人均GNI从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一般而言,本国的通货膨胀率越高,本币兑美元汇率贬值的可能也越大。因此,能否跨越这个以现价美元计价的中等收入阶段,是由真实的本币人均GNI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本币美元汇率共同决定的。东亚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计算,以日本为例,在以美元计价的十倍收入跨越中,真实的人均GDP增长率贡献累计2.2倍,通货膨胀率累计(GDP平减指数)贡献3.2倍,本币兑美元(官方汇率)累计贡献1.5倍。韩国的轨迹与日本则稍有不同,真实的人均GDP增长率累计贡献3.1倍,通货膨胀率累计贡献5.1倍,本币兑美元贬值累计贡献0.6倍。而新加坡的结构与日本相似,中国香港则与韩国类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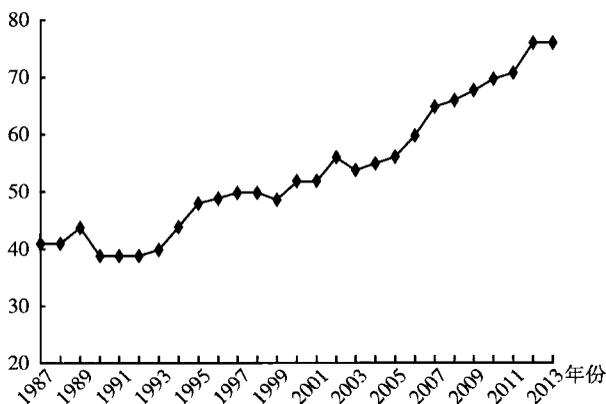


图4 1987年后历年按世界银行体系的高收入国家数量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从以上的分析与东亚的实践来看,本文按世界银行的收入阶段计算办法,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所

需时间表达为如下的动态规划问题,并作一般意义上的定量描述。

目标函数:

$$\min_{i=n} xyz - bh$$

约束条件:

$$x = \prod_{i=1}^n (1 + x_i), i = 1, \dots, n$$

$$y = \prod_{i=1}^n (1 + y_i), i = 1, \dots, n$$

$$z = \prod_{i=1}^n (1 + z_i), i = 1, \dots, n$$

$$h = \prod_{i=1}^n (1 + h_i), i = 1, \dots, n$$

$$axyz - bh \geq 0$$

$$x_i, y_i, z_i, h_i \in [-1, 10], i = 1, \dots, n$$

$$a, b, x, y, z, h \geq 0$$

模型中, x, y, z 为上文中提到的影响跨越的三个因素:真实的本币人均GNI、本国的通货膨胀率和本币美元汇率; x_i, y_i, z_i 则分别代表三因素每年的增长率; a, b 分别为中等收入阶段上下限的阈值; h 为累计阈值的变化, h_i 为每年阈值的调整率; n 为年数; x_i, y_i, z_i, h_i 取值区间根据1960年以来的经验数据将其简化表达为 $[-1, 10]$ 。上文对东亚实践的总结选取的1000~10000美元的收入阶段,是由于世界银行的收入阶段划分在1987年才首次颁布,无法衡量这之前东亚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真正时间长度,而现在1000~10000美元已不能代表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因为,世界银行颁布的2012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已经是1261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自1987—2012年公布的高收入门槛来看,大体是年增高3%,即 $h_1 = h_2 = \dots = h_n = 3\%$ 。这样假定中国今后的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维持过去10年的复合增长率水平($y_1 = y_2 = \dots = y_n = 4.48\%$),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已进入合理的均衡区间因而今后保持不变($z_1 = z_2 = \dots = z_n = 0$),如果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能保持年增6%,即 $x_1 = x_2 = \dots = x_n = 6\%$,这样,人均GNI从2013年的6560美元,大体需要再过10年的时间,即2023年前后中国人均GNI可以越过那时约17000多美元的高收入门槛。

由此可见,连续10年年均6%的GDP增长率和与人民币美元汇率的稳定不变,是两个关键因素。

以阿根廷为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 2001—2002 年之间,虽然只出现了 4.4% 的负增长,但高企的通胀(GDP 平减指数 30%),导致本币大幅贬值为上年的三分之一,现价美元的人均 GNI 从 2001 年的 8520 美元直降为 2002 年的 4980 美元。可见,成功的跨越也需要合理的通胀水平与稳定的币值体系。另一方面,中日两国经济总量对比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一点。同样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以现价美元计,中国 GDP 总量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 2014 年中国 GDP 总量为日本的两倍。这里既有中国经济增长大大快于日本的因素,也有在人民币兑美元稳步升值的同时,日元兑美元大幅贬值的因素。如果遇到像目前俄罗斯这样的情况,经济因内外因素包括国际制裁而下行,本币兑美元汇率又巨幅下挫,这样,按世界银行的人均现价美元标准划分的收入阶段,等于一下子倒退回去很多年而需要重新开始,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就会长期向后延迟。

综上所述,中等收入陷阱在国内之所以展开如此多的讨论,学者们真正想表达的愿景,是让中国能实现或复制东亚式的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而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以 13 亿人口的大国几乎完全复制了东亚较小经济体的速度。但能否如东亚奇迹一样,完成中等收入阶段的完整跨越,则取决于我们今后 10 年的经济表现。比较起来看,我们的成功与东亚经济体有许多共同之处,除了人均资源状况与文化背景相近,主要是:其一,都实行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是追赶跨越的必要条件。其二,我们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一样,都在战后进行过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土地的分配比较均等,为工业化起飞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在发展中国家颇为难得,也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其三,我们与东亚经济体一样,都有一个有效率的发展主义的政府,社会秩序、公共财政金融环境较为稳定,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战乱不断、社会不稳或宏观经济政策大幅摇摆、恶性通货膨胀持续等现象,从而保证了经济追赶不可或缺的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

但是也要看到,与创造了奇迹的典型东亚经济体相比,我们也有不同和不利之处。其一,东亚经

济体均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实现了可融入的城市化,而且特别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农村衰败和城市贫民窟的问题,从而实现了国民基本权利的均等化。城市化和市民化为国民经济和人力资本的不断升级奠定了基础。而我们今天正面临严重的城市二元结构和二元体制问题,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居无定所、游离在城乡之间,构成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其二,东亚经济体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全过程中,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始终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相对很低的水平上,从而名副其实地实现了包容性增长。而我们则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严重贫富差距。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增长,在土地、劳工、财税和生态环境方面,实行了众多有利于资本的政策,但由于法律环境和产权保护的制度缺陷,富裕的有产者仍然心有余悸甚至转移财产,这又反过来进一步使政府不敢采取连西方国家也普遍采用的收入和财政税收等调节工具,这种投鼠忌器的恶性循环显然相当危险。其三,如韩国和我国台湾,在中等收入的前中期都是威权统治,但到了后期,在城市化、市民化的社会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下实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效协调,而如何协调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力、创新氛围与社会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现中等收入跨越的重大挑战。

七、结论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提出短短几年,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研究和热议,在中国更是成为官方和民间都一致采用的标准话语。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虽然相当具有吸引力,但其定义并不准确且有很大缺陷:各种比较意义上的陷阱其实并不成立;与阶段等同的陷阱缺乏存在的价值;与经历了几千年(从工业革命以后算起也是几百年)的低收入阶段相比,把只有几十年时间的中等收入阶段说成陷阱并不恰当。抛开在陷阱的不同定义和理解上的纷争,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就经济表现来说,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必须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实现如东亚奇迹那样 20 年左右的跨

越需要一系列内外条件的配合。经济成长的持续性和币值的稳定性只是结果性的标志。从东亚经验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提供跨越所必需社会公共品的有效有为政府,是两个必要条件。同时,成功的城市化转型、合理的贫富差距以及激励创新的开放性社会政治体制,也是成功跨越难以割舍的要件。当下中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最好位势和关键时期,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应对今后10年的综合挑战。

参考文献:

- 巴里·艾肯格林,2014:《“长期停滞”绕得开》,http://magazine.caixin.com/2014-03-07/100648020.html。
- 蔡昉,2011:《“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第12期。
- 蔡昉,2012:《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探寻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胡鞍钢,2010:《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代经济》第15期。
- 华生,2013:《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东方出版社。
- 胡永泰等,201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格致出版社。
- 孔涇源,2011:《“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改革》第10期。
- 林岗等,2011:《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
- 刘世锦等,2011:《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
- 刘伟,2011:《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模式》,《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 林毅夫,2012:《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进行结构持续升级,避免中等收入陷阱》,“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1次报告会。
- 乔俊峰,201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公共政策因应:韩国做法及启示》,《改革》第8期。
- 斯宾塞,2011:《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机械工业出版社。
- 史晋川 郎金焕,201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东亚的启示》,《浙江社会科学》第10期。
- 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中国金融出版社。
- 田国强 陈旭东,2013:《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及其跨越之道》,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
- 吴敬琏,2012:《不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资本市场》第6期。
- 王一鸣,201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第3期。
- 姚洋,2011:《包容性增长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第12期。
- 郑秉文,2011:《“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 郑秉文,2012:《中等收入陷阱:来自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
- 张德荣,2013:《“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经济研究》第9期。
- 张卓元,2011:《转方式调结构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新视野》第2期。
- Aiyar, S. et al(2014), “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http://www.wyxxwk.com.
- Eichengreen, B., D. Park & K. Shin(2012),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11(1):42-87.
- Eichengreen, B., D. Park & K. Shin(2013), “Growth slowdown redux: 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 income trap”,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673.
- Jonathan, A. (2011), “Chart of the day: Is there really such a thing as a ‘middle-income trap’?”, UBS Investment Research, Emerging Economic Comment.
- Kar, S. et al(2013), “Looking for a break: Identifying transition in growth regime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38(B):151-66.
- Pritchett, L. & L. H. Summers(2014),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 Woo, W. T. (2011), “Understan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Malaysia”, World Economy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GEP) conference.
- World Bank(2007), *East Asia & Pacific Update: 10 Years after the Crisis*, The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 World Bank(201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责任编辑:杨新铭)